

斯



大

政

林

治

[英]艾萨克·多依彻著

于 干 译

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记

4

50260

DF80/30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斯大林政治传记

[英]艾萨克·多依彻著

王 王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斯大林政治传记(英)艾萨克·多依彻著 于干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3 插页 4 字数 537 千

1982年11月第一版 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书号：11118·101 (内部发行) 定价：2.27元

第二版序言

《斯大林政治传记》这一版是在该书写成约二十年后出版的。当1948年夏季我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斯大林尚处于权力的顶峰，为全世界所钦佩和恐惧，并在他的国内受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崇拜”。当时世界的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苏联还是一个核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还颇有一段距离；而斯大林同铁托的破裂刚刚才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我在该书的最后谈到了对斯大林的估价：

到此我们就暂时停止叙述斯大林的生平和工作。我们并不幻想能够从中得出最后结论，或者根据它来对这个人以及他的成就和失败作出肯定的判断。在经历了这样多的高潮和低潮之后，他的戏剧似乎现在才达到了顶点；而我们不知道这最后一幕将比前几幕有什么新的景象。

现在我这本书新增加的一个部分（即关于斯大林最后岁月的补篇），就是叙述这“最后一幕”的。1948年以后，我书中的这位主角的戏剧的确达到了最高潮，终于导致了随后斯大林崇拜的崩溃。但是我对斯大林作用的估价，现在看来也许有点过于谨慎了，因为斯大林晚年的活动和行为，对于他先前的记录并没有提

供任何新的景象，而只不过使我已经描绘过的景象轮廓更加鲜明而已。当时我在书的结束部分已经预见到所谓的非斯大林化。

我经常被问道，根据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在1956年二十大和以后的“揭露”，是不是有必要对我的观点进行修正。说实在的，对于我在本书中谈到的斯大林掌权的经过，他同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关系，他在内战时期的政策，他对大清洗的指挥，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作用，那些揭露并没有增加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在斯大林生平的所有这些重要阶段，本书所提供的材料比苏联读者迄今能够看到的要丰富得多。因此可以顺便说一下，我的这本《斯大林政治传记》在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仍然是一本禁书。

我也不完全相信赫鲁晓夫的“揭露”，特别是不能接受他这样的断言，说什么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断言显然意在贬低斯大林而吹捧赫鲁晓夫自己。它同许多可靠的目击者的证言是不符合的。这些目击者有西方的政治家和将军，他们是没有理由故意夸大斯大林的作用的，也有苏联的一些将军，他们最近在这个题目上以一种严肃而带有批判性的语调写了一些东西。

根据赫鲁晓夫的揭露，斯大林的活动只有一个方面对我来说似乎是更清楚了，这就是斯大林镇压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以及牺牲他的追随者斯大林分子的规模和程度。在本书新增加的一章中，我分析了这一重要事实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阶段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赫鲁晓夫一班人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性质和作风。除此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对斯

大林生平的叙述和解释。同本书的第一版比较，我在这儿只作了极少的改动和文字上的润色。

艾·多

1966.10.11.

导　　言　（1961年）

我在十三年到十四年前写的这本传记，其对象是一般的读者，而不是专家，而且我尽可能平易而无争论地叙述有关斯大林及其事业的一些重要事实。当我开始计划这部著作时，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报刊还没有完全克服战时对斯大林的奉承；而当我最后完成它的时候，柏林空运的机声正在吼叫，斯大林已成为冷战中的恶人。我认为，政治气候中的这些剧烈变化并没有影响我对斯大林的论述，因为我从来就不是崇拜斯大林的信徒；而冷战也不是我要从事的战争。不过，书出版后不久，一个英国评论家就写道：“就象它的题目一样，这本书已经变成热烈的和有时是凶猛的争论焦点……近年来还没有过一本传记引起这样有兴趣和招致这样激烈的怨恨及敌视。”我也许还可以补充说一下，大多数的英国评论家对待这本书还是坦率而大度的——不过，“凶猛的争论”事实上的确进行了许多年，特别是在大西洋两岸的外国。

对于这本书是毁誉交加，众说纷纭：有的人把它当成对斯大林主义的谴责，有的人把它当成为它进行的辩护，而有时一些人又把它当成既是谴责又是辩护。因此，已故的摩西·皮雅杰（铁托元帅的朋友和同事）有一次曾向我解释他的政府为何不准出版《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南斯拉夫版。他说：“你看，你

的书毛病就出在，当我们同俄国人争吵时，它对我们来说是太亲苏了；而当我们想同他们友好时，它又太反苏了。”（他还眨巴着眼睛补充说：“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允许出南斯拉夫版，因为如果我们出版了它，任何人都会立即看出，我们的那些大理论家是从什么地方吸取他们大半的智慧。”）

按照肖像画的一条古老的金科玉律，一幅好的肖像画，要表达出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使观者能够从画上看到不同的面孔。对于这条规律也许还可以加以评论；但如果按照它来判断，《斯大林政治传记》可以说还描绘的不错。不论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评论家，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幅肖像中找得他所想找的东西和读到他愿意读到的东西。我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性格的高度复杂性；在我描绘的这幅画像中，斯大林从正面来看是列宁的子孙，从侧面来看却是伊凡雷帝的子孙。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却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承认，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要努力做到的是老式的客观主义；而我也必须承认，客观主义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因此我必须努力以赴。对我来说，最容易不过的是写成一本谴责性的斯大林传记，因为差不多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已经反对斯大林主义；还在强迫集体化正在进行时，我就谴责过它的残暴（不象我的某些批评者那样，他们是在事件发生后二十或二十五年才来谴责它）；至少从1931年起，我就严厉地批评斯大林的政策方便了纳粹的兴起；我揭露了大规模恐怖、清洗和当时正在上演的莫斯科审讯；等等，等等。简言之，我是一个“早熟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如果我打算把过去近二十年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那些东西简单地重复一下，那末我写成的书就不会有人批评它是为斯大林辩护了。

但是，我决心不从智力惯性出发来写这本书。对于这个我十分熟悉的研究题目，我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和批判的观点。有的评论者说我探讨斯大林时“冷静而不动个人感情”。其实，这本书的写作深深地牵涉到我个人的经历，我并借此机会默默地反省和批判地回顾我自己的政治记录。我曾经是被斯大林残酷击败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因此我不得不问我自己：他为什么得到这样的成功。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党派观念的人就必须变成历史学家，平心静气地检查原因和结果，坦率地观察对手的动机，看到并承认对手力量之所在。如果仅仅因为形势的某些因素和机会尚未被认识和决定，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的行动对于特定形势的影响尚在未定之天，一个政治战士是不容许对自己在其中活动的形势持极为严重的决定论观点的。相反，历史学家不能不是决定论者，或者装成决定论者，因为除非他指明原因和结果是如此紧密而自然地交织在事件中，已经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也就是说，除非他指出他所涉及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他就没有充分完成自己的任务。有党派观念的人要对付的是变动不定的环境，因为在一切方面，人们尚在行使冲突的意志，集结力量，使用武器，实现或者推翻决定。历史学家对付的却是事件的固定而不可逆转的格局，因为一切武器都已使用过了，一切意志力都已用尽了，一切决定都已实现了，不可逆转的东西就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了。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探讨，这就说明了贯穿本书的那种争论很多的不可避免性的含意。作为一个有党派观念的人，我否定了我的主角的许多行为；而作为传记作者，我又指出它们的不可避免性。然而这种矛盾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在这两方面，

我都是从相同的哲学-政治前提出发来辩论的，所不同的和部分矛盾的只是观察的角度。

对我的方法执异议显然是有足够理由的。当我发表《斯大林政治传记》时，其中所叙述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和变成不可逆转的事。比如，仍然可能象西方一些重要政治家和评论家所预期的，苏联的力量将从东欧“滚出去”；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苏联工业的进展将会停滞下来，等等。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东欧战后的革命尚在进行中，我就把它们说成是不可逆转的；战争刚刚结束，苏联大半还是一片废墟时，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苏联的工业将持续上升。我应该承认，在作出这些政治判断和预言时，我是冒险的，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对此都是避而不答的。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读者们将会原谅我在这方面的冒失，而在判断我提出的一些明确的和含蓄的预言时，他们将会考虑它们是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还有另一种批评可以在此重复一下。这种批评说，由于我把斯大林的胜利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我毕竟是在为他的记录进行辩护。这一批评暗示，明智的人总是或总应该是甘心于不可避免的事的。我不同意这种暗示。人类历史中某些最可以骄傲的阶段，就是当他们同不可避免的事物进行斗争的时候；而且他们的斗争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宣称“存在即合理”的那位哲学家，也曾认为“合理即存在”。历史的过程是在现实和必要的深浅不同的水平上进行着的。这一代俄国革命者在抵抗斯大林的专制中毁灭了，这至少说明他们做的事正是一种历史的必要，只不过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罢了。也许我可以提醒一下批评者们，在指出“斯大林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探讨了它的消极

和积极方面之后，我差不多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著名揭露八年以前，就已在书末着重地预告了非斯大林化的“不可避免性”。我说过：“……历史还不得不严格地净化和重整斯大林的事业，就如它曾经净化和重整克伦威尔以后的英国革命和拿破仑以后的法国一样。”

这一版《斯大林政治传记》同第一版一样，没有什么改动。如果我要重新写这本书的话，我很可能要用不同的文体。但是尽管在细节上会有不同，着重点会有改变，我认为最好现在还是从整体上维持它的原状。这本书多年以来已成为广泛而热烈争论的目标，这一事实很可能已使它的原本成为某种文件似的东西，因而即使是它的作者也不愿意把它修改了。因此，整个来说，我坚持本书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不变。

这部传记最初是打算作为包括列宁生平和托洛茨基生平在内的三部曲的一部。我这个三部曲的写作仍在进行中；但是对托洛茨基研究中的两卷，即《武装的预言家》和《解除武装的预言家》已经出版，第三卷很快也将完成。这一工作的原定计划就是，某些叙述和解释的部分，在三部曲的一部中只是半展开，而在另一部中将予以补充、扩大和突出。即使如此，《斯大林政治传记》却是一部独立的作品，它过去是、今后也还是可以独立地加以阅读的。三部曲其余部分中的知识，将使读者们对本书的主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艾·多

1961.4.24.

第一版序言

这本书对于斯大林生平的叙述，有点模模糊糊地终止于1945—1946年。这是作者目前所能做到的，因为最近两三年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没有看到什么文件可以作为根据。但是我希望，本书最后几章将对斯大林在战后的情况有所说明。就在不久以前，要把他的事迹叙述到1938年或1939年以后，几乎还是不可能的。幸好最近发表了一些官方文件以及西方国家部长和将军们的战时回忆录，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但是，苏联却没有发表过可资比较的文件或战时回忆录。作者在企图考虑斯大林的正反两面情况时，却发现只有丘吉尔、赫尔、贝尔纳斯、哈里·霍普金斯、白宫文件等单方面的证据。作者在另一方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材料，只除了极少数由半官方透露出来的歪曲了的片言只语，其中令人十分惊奇地竟然包括了诸如维尔塔的《斯大林格勒大战》电影剧本。这是迄今为止的唯一渠道，苏联领导人通过它，把那些伟大年代的极少的内幕情况告诉他们的人民。历史女神克莱娥还没有获准进入克里姆林宫。

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最大和最英勇牺牲的国家，竟然只被允许知道有关它的外交、军事和政治背景的最少情况，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悲叹的怪事。西方的作家和回忆录作者自然是根据他们特殊的民族和政治观点来叙述的，因此我希望在

使用他们的证据时，我已经充分地考虑了那些不可避免的偏见。但是那些著作中观点和判断的千差万别，本身就成为估价其相对可靠性的手段；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在有关斯大林作用的说明方面，其重要事实、甚至细微末节，他们的叙述都是十分一致的。除此之外，我还利用了一些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政治家亲口告诉我的印象和情况（它们涉及斯大林生平的这一时期和其他时期），以补文件资料的不足。这些人属于很多民族，执有互相矛盾的观点，他们在不同的时机接触到了斯大林。对于这些人，我要姑隐其名，并对他们表示谢忱。

我理应把这一作品称为政治传记。我承认，我是倾向于研究著名人物的政治活动而不是个人私事的。而且除了这一原因以外，想要叙述斯大林的私生活，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比如他唯一的一封私人信件曾载于他的姨妹 A.S. 阿利卢耶娃的书中，而这本书却遭到禁止发行的命运。差不多所有想研究斯大林生活这一方面的传记家，或者是对此无话可说，或者不得不满足于不能证实的传闻。象托洛茨基这样精明的观察家和著名的作家，同斯大林在政治局中相处了近十年之久，他也不能免于这种通病。

至于斯大林生平的初期和中期，到不缺乏文字材料，但它又太丰富和太矛盾了，以致使得传记作者感到苦恼。斯大林的生平就象一张大羊皮纸，其上重重叠叠地写着许多笔迹，起迄日期不同，书体不同，对事件的说法也不同。甚至斯大林的亲笔也是如此明显地矛盾。我相信这本书的读者将在其中找到对这种奇怪情况的解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注视着这张羊皮纸的情况，现在我又再一次逐条地考察了它，对于互相矛盾的说法

加以比较、核实和互证。我在本书中提出了我的发现。但是，我不想把我据之得出结论的对复杂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的材料堆砌其中。我可以肯定，这样做是会使读者十分厌烦的。然而，学者和专家将在本书的脚注中找到必要的线索，我在这些脚注中经常把对斯大林敌视和友好的材料来源一并注出。

本书原打算作为传记性三部曲的头一部分，其余两部分是《列宁生平》和《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关于1917年以前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诸如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无产阶级先锋队”等思想历史的主要研究，当然应该放在列宁的传记中。在目前的这本书中，对于这些思想的成长和演变情况，只是在为了理解主角的必要情况下才简略地提及。《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主要部分自然是讨论十月革命和内战以来的布尔什维主义观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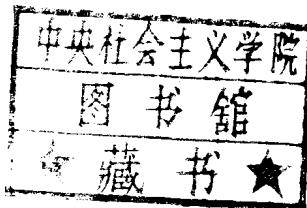
（下面略去两段表示感谢别人和妻子的话。）

艾·多

目 录

DT-60/30

第二版序言.....	1
导 言(1961年).....	4
第一版序言.....	9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1
第二章 地下社会主义者.....	32
第三章 总演习.....	58
第四章 柯巴变成了斯大林.....	108
第五章 1917年.....	149
第六章 斯大林在内战中.....	199
第七章 总书记.....	260
第八章 “大转变”	337
第九章 渴望权力的诸神.....	395
第十章 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一)(1923—1933年).....	443
第十一章 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二)(1934—1941年).....	476
第十二章 大元帅.....	530
第十三章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573
第十四章 胜利的辩证法.....	629
第十五章 补篇：斯大林的最后岁月.....	653
译者的话.....	719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斯大林的父母：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和叶卡特林娜·格拉泽——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后来的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高加索）哥里城出生（1879年），度过童年和学校时代。——格鲁吉亚民间传说的影响。——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1894年至1899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格鲁吉亚人反俄罗斯化的斗争。——斯大林以“小乔”为名在1895年发表诗文。——秘密读书会。——1898年参加“麦撒墨达西”（第三集团）。——高加索的产业暴动。——作为社会主义演讲实习生的斯大林。——他被开除出正教中学。——农奴制的烙印。

也许在1875年，也许在此以前的一二年，一个年轻的高加索人维萨里昂·伊凡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离开了高加索首府梯弗里斯附近的吉第里洛村，定居于格鲁吉亚的一个小城镇哥里。他在那儿开始了小鞋匠的营生。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格鲁吉亚农民的儿子，这些农民仅仅在十年以前还是农奴。他生下来就是某个格鲁吉亚地主的奴隶。如果他一生都是奴隶的话，就绝对不会自由地离开他的故乡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工匠。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祖先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他们被固定在土地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一个地主

的手里转到另一个地主的手里。甚至在维萨里昂童年的时 候，格鲁吉亚的报纸上还登载着一些广告，说明地主出售或求购“五百或一千亩土地和五十或一百五十名农奴”。奴隶买卖经常是欺骗性的；格鲁吉亚法院的档案中，有一些案件曾记录着，同一个农民家庭曾同时出售给三个或更多的买主。^①

维萨里昂当时必定是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离开他的村子的。他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了，而且这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工匠，他希望能够挣得一些财产。在哥里，他和出身同样微寒的一个女孩子叶卡特林娜结婚，她是汉巴勒乌里村农奴格奥尔基·格拉泽的女儿。就象许多贫苦农民的女儿一样，她迁移到城镇，成为某个亚美尼亚或俄罗斯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仆。(高加索的资产阶级是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差不多还没有格鲁吉亚的资产阶级，格鲁吉亚人或者是乡绅或者是农奴。)叶卡特林娜同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结婚时才十五岁。在一个人类成熟就象在亚热带阳光下葡萄成熟一样快的地方，这种早婚是并不罕见的。这俩口子在哥里郊区租了一间破房子，月租是一个半卢布(约合两个先令)。它只有一间厨房和另一间住屋。那间住屋不到五个平方码，很潮湿，从一个小窗子透进微弱的光线。它的门直接开向单调乏味的院子，而由于屋子的地面同院子一样平，没有台阶隔开，一到雨天，泥水就从院子往房子里灌。地面是砖铺的，全部的家俱就是一张小桌、一个凳子、一张沙发，一张木板床，上面铺着稿荐。^② 朱加施维里一家的住宅现

① 弗·马哈拉泽《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载《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第1卷，第488页。

② E·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大林一生中的里程碑》，第7页。